



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书

基督教 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

何凯立 著 陈建明 王再兴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基督教 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
A Study of Their Programs
Operations and Trends

何凯立 著 陈建明 王再兴 译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陈克坚
责任校对:施志君
封面设计:米茄设计工作室
责任印制:曹琳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 (美)何凯立著;
陈建明,王再兴译.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4.8
ISBN 7-5614-2862-6

I. 基... II. ①何...②陈...③王... III. 新教—
出版工作—文化史—中国—民国 IV. G239.2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75244 号

书名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1912—1949)

著者 (美)何凯立
译者 陈建明 王再兴
出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印刷 郫县犀浦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20 千字
版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3 000 册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
联系。电话:85408408/85401670/
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网址:www.scupress.com.cn

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何凯立博士

(Herbert Hoi-lap Ho, Ph.D., J.D.),

广东梅县人，

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

美国西密芝根大学硕士、

芝加哥大学博士、

约翰马歇尔法学院法学博士，

美国执业律师。

译者序

1

译者序



基督教会将文字创作与翻译，书报刊印刷、出版、发行等工作称之为“文字事工”，其实即新闻出版事业。不少传教士认为文字布道是相当重要的传播福音的手段。著名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提出：设教堂讲道、办学校和开医院，对于传教来说都太慢，收效不大，只有文字出版才是“以百万计地进行感化”的方法；“别的方法可以使成千的人改变头脑，而文字宣传则可以使成百万的人改变头脑”^①。1839年来华的美国传教士玛卡雷·布朗认为：“单纯传教工作，是不会有有多大进展的，因为传教士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无知’的官吏们阻挠。学校可能消灭这种‘无知’，但在一个短时期内，这样一个地域广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里，少数基督学校能干什么，这就是出版书报的办法。在该项杂志和书籍内，不但能传播基督教福音，同时还传播一些现代的科学和哲学。”^②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文字出版始终是在华基督教差会注重的
工作之一。从1807年马礼逊入华传教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止，西方传教士在中国设印刷厂、出版社，翻译、写作并出版了

① 江文汉：《广学会是怎样的一个机构（上）》，《出版史料》1988年第2期，第34页。

② 马祖毅：《中国翻译简史》，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241页。



大量图书和小册子，兴办了许多期刊。据统计，1938年全国有70所基督教新教出版发行机构（其中大部分在上海），还有130家出售基督教读物的书局、圣教书会、图书馆、图书室等。1912—1949年，基督教出版机构共出版了大约3000种图书，2700种小册子，260种期刊。

天主教也建立了一些出版机构，但无论是规模和数量都比不上新教。截至抗日战争前，天主教在华设立出版机构26所，发行150种定期刊物。东正教在中国则基本上没有像样的出版活动。

近代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可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清代末年，即19世纪初到1911年，是其蓬勃发展、对中国社会产生巨大影响的时期；民国时期，即1912—1949年，随着中国非宗教书刊出版机构的崛起，和中国知识分子主动引进西学，教会的文字事工便逐渐沉寂下来，对社会的影响力不再明显。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效果虽不令教会人士满意，但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却是不容低估的。它曾经对中国的社会、科技、思想、文学、语言以及新闻出版产生过积极影响，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因而有必要对其加以研究。几十年来，国内外有许多学者以不同视角探讨了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但多为单篇文章或书中的一章一节，尚缺乏成体系的专著问世。何凯立博士所著《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本书作者何凯立博士（Herbert Hoi-lap Ho, Ph.D., J.D.），广东梅县人，香港中文大学文学士，美国西密芝根大学硕士，芝加哥大学博士，约翰马歇尔法学院法学博士，美国执业律师。除本书外，他还著有《中美贸易》、《直销法规》等著作。何先生在留学美国时，以近代在华传教士出版事工作为博士论文研究专题。



1988年香港中国基督教研究中心 (Chinese Church Research Centre) 出版了该书的英文版。

作者认为自己将新教在华出版事业作为他的博士论文，是因为“这项研究的意义将不仅局限于作为出版史研究的一部分，而且还将有助于对基督教差传使命的方方面面有更深刻的理解，有助于对现代中国之社会和文化史有更深刻的理解。另外，对从事文化传播学方面的学人来说，本研究成果也将是一份不可多得个案研究材料，它揭示出一种异域文化信息是如何通过印刷媒介来实现其本土传播的。”(本书绪论)

我作为译者之一，在翻译过程中曾反复咀嚼这本书，认为它虽然只有20余万字，但却是一本学术含量较高的力作，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资料丰富

作者利用在美国求学的机会，走遍了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各差会的档案部，翻阅了大量的图书期刊。写作中参考的中外文的文献有著作、报告、年鉴、年报、期刊和图书目录索引等。其中有许多资料是目前在国内见不到的。作者还当面请教了当时尚在世的中国基督教前辈，一位是传教士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教授，另一位是中国基督教作家兼翻译家谢扶雅先生，他们二人都熟悉民国时期新教在华出版情况。

本书参考的综合性资料有赖德烈 (Kenneth Latourette) 的名著《基督教在华传播史》，司德敷 (Milton Stauffer) 主编的《中华归主》和鲍引登 (Charles L. Boyston) 编辑的《基督教在华传教运动手册》，季里斐 (Donald MacGillivray) 著《基督教差会在华百年，1807—1907》；年鉴类有《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英文版的《中国



教会年鉴》(*China Mission Year Book*)和《中国年鉴》(*China Year Book*);英文期刊《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刊登的社论、文章、研讨会报告以及短讯中记载了许多基督教文字事工的情况。本书参阅的世俗出版业综合性论述,则有张静庐编《中国出版史料》丛书,杨寿清著《中国出版界简史》,杨家骆主编《图书年鉴》以及王云五著《新目录学的一角落》。

作者参考的专门介绍新教在华出版活动的资料有:金多士(Gilbert McIntosh)著《差会在华出版机构》,比较详细地讲述了新教在华出版机构的历史发展情况;《中国基督教文字工作情况报告》(1922年由中国续行委员会发行)和《1933年基督教文字工作会议纪要》是关于新教出版的专题报告;吴耀宗著《基督教文字工作的回顾与展望,1938—1946》一文补充了1941年以后的信息;1945—1947年基督教联合出版社的年度报告亦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前夕的出版情况;顾子仁所著《在华新教出版机构》一文提供了民国期间新教期刊的创刊、发展情况及其评价的详细信息。

各出版机构的年度报告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关于四个主要的新教出版机构——广学会、青年协会书局、三大圣经公会、圣教书会的历史沿革、经营情况和出版物情况,作者主要是根据它们的年度报告加以考察。罗雅各(James Roe)著《大不列颠及海外圣经公会史:1905—1954》介绍了圣经公会的工作开展情况和它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与其他两个圣经公会的合作过程。基督教青年会汇编的《全国委员会年度报告》记载了大量青年协会书局的出版情况。

作者有关新教出版物的书目信息的资料 also 具有很高的权威性,它们是《中国基督教中文图书分类目录索引》的1918年版、



1933年版、增补版和1938年版。为使信息更完整，其他书目工具也被纳入考查之列，如新教各主要出版机构出版的编目，以及基督新教《出版界》（*The China Bookman*）杂志。

对于本书所选取分析的《青年进步》、《天风》、《文社月刊》、《真理与生命》、《福幼报》、《女铎报》和《田家》7种有代表性的期刊，作者查阅了所有能找到的各期目录及相关文章。

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到，本书的写作是建立在非常扎实的资料基础上的，这是本书获得成功的主要原因。

二、结构、编排合理

本书论述没有包括所有宣教出版物。因规模的限制，作者首先关注的是那些由在华传教士亲手创立或赞助成立的书局或出版社，以及它们针对公众读者出版发行的中文书刊；时间范围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8年间。这样就排除了对中文以外的出版物和民国以前的出版物的论述。另外，天主教出版物也不在本书探讨之列。当然，作为背景信息，本书对差会早期的活动作了简略介绍。

新教差会出版史的研究可采取多种途径：如出版物的内容、出版物的分类、发行机构等。本书试图采用所有这三种方式并覆盖这几方面的全部内容。不过，它基本上是一部通过对出版物的内容予以批判性分析研究的历史专著。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大量的统计表格和文字看到。统计图书题材内容的表格就达到15个以上。

在结构上，谋篇布局也比较合理。除绪言外，正文有八章：第一章展示了民国时期的文化和历史背景，说明传教士是在什么样的时代背景中开展其出版工作的；第二章讨论1912年前后传



教士在中国的历史角色与工作特点；第三章集中讨论传教士在华创办的主要出版与发行机构，以及它们的历史沿革、组织结构和独特的社会功能；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一些专题出版物的策划、运作和内容；第六章、第七章讨论期刊出版物，而且是从它们的创办宗旨与题材分类来着手；最后一章总结前述各章的主要观点并尝试对新教出版事业的特点、问题和影响提出自己的看法。

一部历史类著作尽管应当依据丰富的资料，但绝不意味着堆砌资料，而是应当去粗取精，有所选择，并在分析的基础上对某事某人得出自己的评判结论。在材料选取上，作者对那些只针对极少数专门读者的出版物，如中文经典索引或医学教科书方面的出版物则没有包括在研究的对象之列。在分析图书时，仅作分类或列出书名；对期刊也仅作分类或列出文章篇名。未对图书和期刊的内容作许多引用或描述。这样就节约了大量篇幅。

书中列有大大小小 35 个统计表格，既为读者提供了一目了然的数据资料，又节约了许多文字篇幅，足可见作者付出的心血和良苦用心。

三、持论公允

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涉及思想、文化、科学、技术诸多方面。不过，一般认为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基督教出版事业在社会上的影响大为减低。其原因是：民国成立后，中国非宗教出版事业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出版机构数量大增，而且像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在编译能力和出版发行能力上已经日趋成熟。国民政府也兴办了许多报刊社和出版机构。在教科书出版方面，国民政府加以控制，设立了国立编译馆，编译和审定学校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并组织官办的出版



社和一些大的私营出版社专门出版教科书和大学教育参考书。基督教出版事业的繁荣时光已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虽然在总体上肯定新教在华出版事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刻意夸大其社会影响，而是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作者在论述了整个新教出版状况后，对其社会影响做了总结。他认为：总的来说，民国期间新教出版物的影响力不如 19 世纪晚期，那时关于新知识的新教出版物是西方文明向中国传播的主要媒介。1911 年以后，许多大型的、高度资本化的世俗出版机构成长起来，它们接管了学生课本和普通知识读物的出版业务，于是新教出版机构只能集中精力为教会群体出版宗教读物。中国知识分子认为，基督教作品的文字风格一般都较差，思想内容浅薄，而且所载信息要么是些无关痛痒的话，要么就是一些不能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东西。“由此可见，尽管民国时期传教士们在推动教育和社会改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他们通过出版物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努力却不是很成功。即使是在教会群体中，新教出版物也没有太大的影响力，大部分的新教图书、小册子和期刊的发行量都很小，进一步证明了这一点。”

作者进一步指出，在民国时期，新教出版机构的出版物数量只占全国出版行业出版物总量的一小部分。1927—1936 年是中国政治和社会形势比较稳定的时期，因而也是中国出版业最繁荣的时期。以这段时期为例，仅商务印书馆一家的出版数量就达到了 9 654 种，约占全国出版物总量的一半。而同期新教各出版机构的全部出版物才 2 845 种，只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物总数的 30%，或是全国出版物总数的 13%。全国出版行业的总产出状况表明，涉及所有宗教类型的宗教类出版物在全国出版物产量中只占有非常小的比例。这一事实强有力地说明，在新教出版物中占有绝大



部分的宗教类读物是民国时期读者大众需求最少的读物。

作者最后指出，新教出版物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是难以评估的。民国时期中国基督教群体从人数上讲有所增长，其中一部分人皈依基督教也是从阅读《圣经》开始的。但是，那种要通过“以基督教文字扎根中国”来造就一批又一批中国基督徒的愿望却始终没能实献。事实上，从来也没有这样大规模且协调一致的出版工程付诸实施。与整个中国出版业相比，新教出版工作在产量上没有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从出版物的内容上来讲，虽然也有部分内容涉及当时社会所关注的问题，但新教的出版人却无法有计划地去满足当时处在战乱和在寻找自我的人们的心灵上的需求（以上参见本书第八章结论）。

据译者掌握的情况来看，传教士的文字工作的确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效果。1922年5月，中国圣教书报公会在报告书中指出：“教会预备书籍，历年以来，可称已有成绩，但尚不见流行全国。人人都说销售一事，大不得法，所以不特中国不识字者，不能看见教会各书，就是识字者竟有终身不见教会一本书的。”^①到了1948年，中华基督教全国第五届会议召开时，其情况仍然是：“基督教文字事业提倡多年，成绩虽略有可观，但关于布道文字之提倡，尚觉迟缓，教友对教会之认识，基督要道之了解，甚为有限。”^②一位教会人士在回顾1910—1950年期间的基督教出版事业时，对其工作状况颇感不满，他说：“这一盘散沙的出版单位，缺乏领导，不能合作，哪里是出版，简直是做旧纸店的批发工厂，成千册万册从印刷所买进来，不多时，成捆成担的向旧纸行卖出去，或转手分别向烂货行集中，如此出版！如此推

①《基督教全国大会报告书》第293页，1922年。

②《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议录》（六）文字事工，1948年。



销！如此四十年之基督教出版界！”^①

至于民国时期新教出版事业为何没有取得较明显的成效，作者认为它受到了四个主要弊病的困扰：一是缺乏统一的文字出版工作计划；二是差会对文字工作提供的资金不足；三是中国本土的作者太少；四是传教出版物“洋味”太重。这些见解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还应加上一条，即基督教出版物的受众也是很小的。就教徒数量来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基督教徒共约400万人。其中全国天主教有教区140个，信徒328万人；新教仅有教徒70多万人。而一般世俗读者接触基督教出版物的可能性自然比基督徒要小得多。

作者尽管认为民国时期新教出版的成效甚微，但并非完全否定，而是认为，新教出版事业仍为中国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最显著的贡献是白话本《圣经》及各种方言本《圣经》的翻译出版。另外，《女铎报》被公认为中国第一份正式由书局出版的妇女杂志；《福幼报》同时走进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家庭，而且被视为中国最好的三种儿童杂志之一；最重要的一种新教期刊当数《田家》半月刊，发行量曾达到过每期5万份之巨，对农村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译者认为，这些读物的影响的确不会仅限于基督教信徒，因为，广大教徒也是社会的成员，对教徒的宣传也会波及到他们生活的社区。

该书得以翻译成中文出版，起因于译者与作者一段特殊的缘分。多年来，我一直从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的研究，并陆续将一些心得发表问世。2001年4-7月，经香港中文大学梁元生教授的推荐，我应邀到该校崇基学院做访问学者，除请教专家教授，

^① 汤因：《四十年来之中国基督教出版界》，《金陵神学志》第26卷第1、2期合刊，1950年11月。



出席学术会议外，主要时间都花在搜求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的文献资料上。不经意间，我发现了一本英文著作，题为“*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是由香港中国教会研究中心出版的。见到此书，如遇至宝，没有想到早在1988年就已经有了关于基督新教在华出版史的专著问世，可见自己消息闭塞，孤陋寡闻。欣喜之余，想到自己应当购买一本书，并设法找到作者。根据书上提供的信息，我在沙田火炭找到了出版商的门市部，购到该书，然后向中文大学吴梓明教授打听该书作者。吴教授告诉我，作者中文名应是何凯立，曾在美国留学，校牧室伍渭文牧师应当知道何的下落。于是，我又拜访伍牧师，果然打听到何凯立先生的情况，并与之取得了联系。不久，何先生从北京到香港办事，伍牧师安排我和何先生见面晤谈。我告知何先生自己正在从事基督教出版事工的研究，并问何先生是否有意将其大作翻译成中文出版，以飨祖国大陆学界。何先生闻言大喜，称他正在物色合适翻译人选。我表示愿意承担此项工作。于是，从香港回到成都以后，此书的翻译就纳入了我的工作计划。

由于本人承担的事务较多，精力有限，又邀请我的硕士研究生王再兴同学一道参与翻译。王君非常努力，为完成此项工作付出了大量心血。通过翻译这本《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我们对于这段历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为今后进一步研究该课题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起初，我以为自己多年从事传教史和出版史研究，翻译该书应无大的障碍，计划由王再兴初译，由我校译。但在翻译过程中才发现困难较多，颇费思量，以致在完稿后还花了许多时间来打磨。

首先是一些机构和人名难以回译正确。原作者依据的史料多为英文，引用的中文资料亦译成英文。当遇到专有名词时，能在



中文资料或者工具书中查到当然是幸事。在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翻译的《中华归主》、黄光域先生编的《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郭卫东先生主编的《近代外国在华文化机构综录》，以及一些关于中国基督教史学术著作的附录的英汉对照词语表，给了我们很大的帮助。对于查不到的专名，我们也尽量找到引用的中文书刊加以核对。尽管如此，还有一些专名，或无从下手，或限于身边资料不足，无法核实。对于专名的翻译，我们采取的方法是：（1）对于能够核实的中外机构和人名，采用当时的中文称呼；（2）对于不能查到的机构名采取直译，并注明英文；（3）对于不能查到的外国人名，依照辛华编《英语姓名译名手册》译出，并注明英文；（4）对于无法核实但有拼音姓名全称的人名，酌译中文姓名，注明系译音；（5）对于有拼音姓氏，而名字缩写的中国人名，照录原文，不敢妄译，如“P.S.Pie”、“Y.C.Hsiao”等。

其次是个别统计数字有误。在翻译中我们发现一些表格中关于图书期刊的单列数的合计与标明的合计数不一致，或者是表中的数字与正文中的数字不一致，或者是正文中的数字与史实明显不符。对于这些，我们都尽量查对资料加以更正，但仍恐有疏漏。

再次是原英文著作排版时错漏造成的单词、语句不通。对于这样的问题，或根据词典以多种方式核对，或尽量根据上下文加以疏通。

关于本书的引文，原文是英文的加以翻译；原文是中文的，根据能查到的文献照录。

关于本书的引文出处注释，原书是英文的，一般照录原文；原书是中文的，一般回译为中文。这样做的目的是便于读者查找原始资料。



本书英文版名称为 *Protestant Missionary Publications in Modern China 1912—1949*，应直译为《新教传教士在现代中国的出版事业 1912—1949》。在中国习惯上称新教为基督教，加之本书论述的也不仅是传教士的活动，因而中文版译名为《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 1912—1949》。

全书译毕后，请何凯立博士将译稿审读了一遍。何博士订正了一些原书的失误和译稿的误译，并解决了一些疑问。

本书付印前，又请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研究系邢福增博士、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刘家峰博士帮助审稿，解决了一些遗留问题。他们的无私奉献，使本书质量大为提高。特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

尽管做了以上工作，但诚如作者所言，研究基督教出版事工“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个别人物和数字已经无法回忆。而我们手边又无大量可供查找的资料，对个别核查不到的人名只好付诸阙疑。加之译者学力有限，缺陷在所难免。该书既已翻译出版，在为读者提供参考的同时，也当接受读者的批评指正。这是作者和译者诚恳以待的。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还会有规模更宏大，内容更充实，论证更有力的基督教在华出版史的专著问世。但本书的研究成果和历史作用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来的治学者提供了一架得以继续向上攀登的阶梯。

陈建明

2004年7月30日

作者序

重回首，已是四分之一世纪以前的事了。近代在华传教士出版事工的研究，是我在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专题。

研究这个专题，一方面是想了解出版刊物对传递文化、思想、信仰所发挥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希望对传教士在华的出版事工，作一比较全面的了解和记录。

当时，走遍了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和各差会的档案部，翻阅了无数的残篇断稿，请教了当时尚存的几位前辈鸿儒，遂写成了这篇尚合己意的论文。我在芝加哥大学毕业后，因工作原因，进入法学院攻读。其后在律师生涯中，对在华传教士的研究报道，亦多有阅读，但自己却无暇再作研究了。

中文版的问世，实在非常感谢陈建明教授对书中内容的建议和对出版的大力促成，感谢王再兴同学的从旁协助；在此，亦感谢公垂师在芝加哥大学时的关怀和指导，以及妻子黄鹂的鼓励。

抚卷追昔，于今不但人面多非：扶雅老师、贝德士(M.S.Bates)教授、家父、牧谷和天恩弟兄，已先后息劳归主，而景物亦非依旧：由昔日的风雪芝城，到今日物华天宝的北京。但世道未完，尔旨得成，冀莫扶犁后顾，真是“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

何凯立

于北京景园

2004年5月

1

作者序

